

中德文化丛书

# 总序

##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

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述)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

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到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 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

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在

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外教社)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叶 隼

2007 年 4 月 27 日—12 月 22 日间陆续作于巴黎—布达佩斯—北京



中德文化丛书

# 序 言

张西平

从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经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在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文化的冲突也时时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李约瑟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许理和将其称为这“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所说:“在 1898 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 12 年后,到了 1910 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性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

VII

序  
言

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

如果我们想解释清楚今天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思想的根源，那我们必须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近 20 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此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使我们开始逐步摸清我们今天所表达的学术思想、语言，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来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叶隽的著作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路向展开的，如果将其放在近年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或者说这本书在当下学术研究的进程中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我想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在学术界这本书首次如此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晚清传来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具体、深入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西学东渐”的“西学”时不太细分的，当时传来的思想是美国的思想还是法国的思想，这种学科体制是德国还是英国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大都一概说成“西学”。其实，西方是分为不同的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只有具体的研究当时“西学”的来源国，这种研究才会具体化，也才有深度。二是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时，研究者的重点大都放在中国本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的重点没有一个前期对西方思潮和体制的了解，不了解当时西人所介绍的西学来源和所在国的关系，对“西学”本身的特点和“西学”本身的形成和变化注意不够。我们就很难从中国文献本身揭示中国近代制度变迁的特点。叶隽是学德国文化出身，又经中文学科训练，他在这本书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将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放在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变迁之中加以考察，使我们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

这本书的看点之一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属 18、19 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曰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曰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曰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这样 18 至 19 世纪初西方思想的中心是德国,像哈耶克所说的 1870 年“此后 60 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 20 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作者甚至认为:“应该说,自 19 世纪以来,在长达 200 年的时间里,现代世界几乎可以说就是在德国思想的笼罩之下。”

我想这样的结论,这样一种对 19 世纪西方思想的解释是过去许多做晚清史的学者很难听到的。德国在 19 世纪对西方如此重要,德国拿什么东西献给西方现代社会呢?这就是建立在德国哲学思想之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体制。这样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时,就必须重视德国,就必须了解德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和历史。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孔穴来潮,事实上,“到 1900 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在思想和学术上是跟着德国跑的。

正是如此清晰、明确地指出德国在西方现代思想和学术体制上的地位与作用,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我们晚清以来所接受的西学的特点,特别是在学术体制确立上的西学来源,没有这样对“西学”的具体研究,对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

第二,这本书对在中国传播德国思想的主体的转换做了深入的研究。以往在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对其在中国的活动比较关注,对他们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与其本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们在华活动的影响研究不够。作者在书中再次展现了他对德国近代文化和制度的熟悉的特点,在谈到德国来华传教士的这种主体作用变化时他讲了三条原因:“其一,传教士思路从‘功利利益’到‘文化立场’的变迁,反映出帝国消解是大势所趋。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作为政治力量的‘逐渐黯淡’,同样也表现在帝国政治精英层面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其二,某种意义上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现代性’命题正为新一代传教士自觉所认知,现代的兴起乃是不可抵挡的大势所趋。”“其三,由‘帝国话

语’到‘现代转型’的转折,为日后的‘双边学术场域互动’铺垫下很好的基础。”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向中国介绍西学时是直接和德国思想及德国本身在欧洲地位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如何和德国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相通、互动,并深刻地受到本国思想的影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下降和变化直接影响到在华的德国传教士的传教路线的变化。这点在英美来华传教士中也有同样的特点,他们在华的传教特点和路线直接源于其教派在国内的地位和宗教理解,不同的教派、宗教思想的不同,他们在华的传教路线就不同。以往的来华传教士研究中,这点是个薄弱环节,学者们往往只根据传教士在中国的材料来讨论他们的思想。殊不知,西方才是其思想的大本营,所在国才是其传教动力之源。传教士是跨越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我们必须对这座桥梁的两端的文化都十分熟悉,才能做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

在书中,作者对卫礼贤从传教士转换为汉学家的分析十分精彩,对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卫礼贤的转型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但像卫礼贤这样将两种身份聚于一身,并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戏剧性。个人命运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离,在这里显示出历史的吊诡。同时,在卫礼贤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与来华的汉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在许多门类的建立,许多学科的形成不少都和来华的汉学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四部”到“七科”,从经学到现代人文学科,近代来华的汉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叶隽对卫礼贤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样板。

叶隽做中国学人的德国留学史研究已经有显著的成果,在这本书中,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学术积累,通过对卫礼贤和蔡元培、杨丙辰的合作完成了在中国介绍德国西学思想主体的转移的研究,说明了中国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是如何从传教士、讲学者、汉学家转换到中国本土学者手中的。同时,他以中研院和德语专业的建立与发展,说明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学科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这本书的研究中我体会到,我们在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现代学科的建立时必须放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中,新文化运动、近代

学术和文化的产生都是在中外文化的激荡中形成的,而以往的形成研究要么只在中国文化本身考虑,要么只在外部力量考虑,都有道理,但显然不全面。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指出中国近代学术和学科体制是在中外文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一种“学术互动”。而且更深入地分析作为西学内容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传入的具体内在过程,是如何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德语的产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对西学的介绍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主体的转变。这样,作者就真实而细致地通过德国传教士和德国留学生这样两个群体展现了德国思想和文化、德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和制度在中国近代学术形成的实际过程。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多重、多方面、多种力量的复杂过程,实际上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是多种力量集合的结果,是西学在中国长期传播的结果。从卫礼贤到蔡元培,在传播德国西学思想上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不能说传教士从此退出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建立的历史舞台,或者不在发生作用。从同文馆的建立开始,现代学科体制就开始启动,但就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以后,民国初年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即便从德国来说,民国期间的辅仁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立,在中国大学历史上和学术体制与学科制度的建立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说,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传教士—汉学家—留学生”这种主体的转换并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立体的过程,是一个混合而不断渐进的过程。这点作者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建立的丰富历史画面。

近代以来的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中,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sup>①</sup>从历史说,“如果把1910年和1989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学术体制之间有了巨大的间隙,随着中国自己的学问“国学”转换为各门具体学科,学科化的中国学问开始一一纳入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尽管民初关于“国学”的理解曾

<sup>①</sup>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第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引起重大的争论，<sup>①</sup>但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成历史大潮，无法阻挡。

百年西潮最终导致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并由此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了现代化之路。当下，被压抑的现代性在这个千年文化古国中以人类史前所未有的形式喷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其现代化进程之猛烈，社会变迁之巨大，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史都未曾所见。

当中华民族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成为我们现实的生活的环境时，文化自觉之心、之求油然而生，此刻，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百年西潮在推动中国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同时，由此所造成的对中国思想资源的冷漠、忽略，开始反思百年西学思潮所引起的学术制度化、学科规范化在推动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同时，这种规制对中国精神把握的隔离与漏缺。争论由此而产生。

问题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关注国别中心的创造性发展的同时，也应思考具有‘普遍主义’的问题。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是否具有普遍主义的真理可能？或者这只是一种虚构的大同理想？如果每个民族（这里主要指以国家为载体的国家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并且仍将在很长时期内按这样的基本轨迹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建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与共识？它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尝试去回答的问题。”民族文化理解和世界认知，西学学科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这些百年前曾经困惑我们前辈的问题，今天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困惑我们。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像陈子昂在诗中所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过去已经失去，未来尚在探索。学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活跃、混乱，思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分歧、多元，书写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而无力，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纷杂而各奔东西。但这正是伟大时代的特征，这正是—一个新思想、新学术诞生的前夜，探索中预示着光明，争论中渴望着新生。

张西平

2008年7月21日写于北京游心书屋

<sup>①</sup>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



# 目 录

总序 .....	I
序言 .....	VII
第一章 绪 论 .....	1
一、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德国意义 .....	1
二、世界精神、资本时代与现代中国学术规制的生成 .....	9
三、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中介者、边缘人抑或创造家？ .....	21
四、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28
第二章 德国视野里的“基督福音”与“中国心灵”——从花之安到卫礼贤 .....	31
一、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基督教会与传教士 .....	31
二、“自西徂东”之后的“基督福音”——花之安的传教思路与中国意义 .....	40
三、“中国心灵”的浮出水面：卫礼贤的“专业汉学”之路 .....	46
四、近代中国期待视野里的“德国传教士意义” .....	52
第三章 帝国的消解与现代的兴起——以安治泰与卫礼贤的比	

较为中心 .....	63
一、“世界政策”背景下的德帝国与传教会 .....	63
二、圣言会的德国背景及安治泰的民族本位 .....	68
三、同善会的民族色彩与卫礼贤的文化立场 .....	76
四、帝国消解之成立与现代兴起之可能 .....	81
第四章 平生风义师友间——以卫礼贤与蔡元培、杨丙辰的北大交谊为中心 .....	87
一、北大改革背景下的德国文学系创办：卫礼贤与杨丙辰的师生同事之谊 .....	87
二、中德学术因缘的另段佳话：卫礼贤与蔡元培的“惺惺相惜”及其文化史意义 .....	95
三、北大一年：卫礼贤在中国学术场域的定位及其认知 .....	101
第五章 科学原则的确立——以蔡元培、傅斯年等的中研院活动为中心 .....	111
一、从北大校长到中研院长：蔡元培对现代学术机构建制之认知 .....	111
二、社会历史潮流中的学术命脉：傅斯年对史语所学术旨趣阐发的德国背景 .....	120
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科学原则与学术精神之确立 .....	137
第六章 学科建设的推进——以德语文学学科杨丙辰、冯至等的师生关系为例 .....	148
一、先生一代的起点意义：以杨丙辰的学术认知为中心 .....	148
二、留德背景、南北大学与学术承传：20世纪50年代作为创业者的学生一代 .....	157
三、20世纪80年代的社科院外文所与学科建设：以作为学科领袖的冯至为例 .....	168

第七章 结 语 .....	177
一、学科规制生成的核心内容 .....	177
二、“留德学术群”研究的意义——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的枢纽 地位及其缺失 .....	184
三、“学术互动史”命题的提出——以德国学术之世界影响为例 .....	188
主要参考文献 .....	192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 .....	208
人名及关键词索引 .....	216
后记 .....	227



# 第一章

## 绪论

### 一、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德国意义

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属 18、19 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曰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曰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曰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sup>①</sup>

将六项标志性事件中的四项归于德意志，有人或许会问是否过于偏颇？这其中可以质问的地方诸多，

① 当然这个说法未尝不受到施莱格勒的影响，他说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麦斯特》。Schlegel, Friedrich: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论文学).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2 (2. Auflage, 1985). S. 45 - 46. 针对这种说法，有论者如尼柯莱则嘲笑似地提出“腓特烈大帝、美利坚共和国和土豆” (Friedrich der Große und die amerikanische Republik und — die Kartoffeln) 三种时代倾向。Nicolai, Friedrich: *Vertraute Briefe von Adelheid B\*\*\* an ihre Freundin Julie S\*\* IX*. (阿德尔海德·B 致其友尤·S 的私信，1799)，in Mandelkow, Karl Robert (hrsg.): *Goethe im Urteil seiner Kritiker — Dokumente zur Wirkungsgeschichte Goethes in Deutschland* (批评者眼中的歌德——歌德在德国影响史资料). Band I. München: C. H. Beck, 1975. S. 180.

譬如说,怎么可以将英国遗漏?其理由在于,虽然“大不列颠既不缺乏科学伟人,也不缺乏大型机构”,<sup>①</sup>但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段内,英国科学仍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以产业革命为开端、同时执有资本主义时代领袖地位的英伦,其意义要放在19世纪进程里,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物质极大灿烂而显示出来,但在现代学术的建立过程中,它并非领先者。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那位日耳曼血统出身、日后转到英伦的思想史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他对英、德两国的思想史意义做出了特别的强调:

两百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sup>②</sup>

事实上,德国思想的扩张要早于1870年,早在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强势的思想势力。应该说,自19世纪以来,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现代世界几乎可以说就是在德国思想的笼罩之下。如果说这样一种判断或许过于急切,那么我们不妨将其尽可能地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略做些比较性的衡量考评。或者,可以这样表述,现代性的中心场域是在西欧;在近代以来的西欧文明之中,英、法、德基本扮演了三强鼎立的角色,但就精神领域之总体而言,是德国思想占据了引导性的中心位置。诚如英国人自己对19世纪早期思想整合过程的判断:

当现代科学方法及其推动力即数学精神在本世纪前四分之一里从法国闯入德国时,在那里同一种强大的理智组织即德国大学制度相会合,而在这种制度中,古典的和哲学的研究已制定了Wissenschaft的理想——较广意

① [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193页,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7—28页,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义上的科学的理想。精密的即数学的精神逐渐地但不无受阻地被接纳进这个制度,那时以来已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英国,固守于那两所大型大学的古老传统和一个维护这些传统的精英阶级所抱的高度务实的兴趣阻止任何大陆理想,无论 F. A. 沃尔夫的语文学理想还是费希特的哲学理想或者拉普拉斯和居维叶的科学理想,进入这两个古老学术中心。它们毕竟是硕果仅存的带历史性和连续性的高级文化的组织。<sup>①</sup>

这段话涉及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极为关键性的枢纽部分——知识的整合与教育/学术制度的建制问题。毫无疑问,英国在这场现代性竞赛中是拔得先筹者,其文化的核心特征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sup>②</sup>但当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大学成就了其以养成绅士(gentleman)为主的教育传统之时,它同时也就相对趋向于保守。无论是对法国大学的“科学导向”,还是德国大学的“现代革新”,英国人都不太以为然。纽曼在洪堡之后重提“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就是最好的标志,这且容日后细论。18世纪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法国文化,而在我看来,法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科学话语”(science)的确立,这实际上就取决于法国大学体制中的“大学校制度”的确立。虽然早在13世纪时,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就以其国际性而成为大学的

① [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221—222页,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 英国大学理念的代表人物纽曼(John Henry Newmann, 1801—1890)曾如此比较过两种大学的概念:“一种是所谓的大学,它不提供住宿,不督察学习,对修满许多课程及格的任何人都授予学位。还有一种大学则既无教授亦无考试,只是把一定人数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过三四年,之后把他们送出学校,像人们所说牛津大学近60年来所做的那样。如果要我在这两种大学中选择,问我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有利于知识的训练——我并不从道德的角度说哪一种更好,因为显而易见,强制性的学习必定好,而懒散则极有害——如果我必须断定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在训练、塑造、启发人的头脑方面更为成功,哪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更切合现实的任务,训练出更好的公职人员,产生出通晓世情的人和名传后世的人,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那无教授亦不考试的学校,它优于那种强求学生熟悉天底下每一门科学的学校。”约翰·亨利·纽曼《关于大学的概念》,载王启梁主编:《在牛津听讲座——精神的力量》第5—6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或者进一步称:“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的殿堂。”[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第29页,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